

# 才子兄弟冤家手足

## 魯迅與周作人

(一)

● 王尚寬

### 文壇之上各享盛名

魯迅（周樹人）與周作人是排行老大、老二的同胞親兄弟，曾經相伴成長，同窗共硯。長大後一同赴日留學，以後都能

「辣手著文章」，在文壇上各享盛名，但爾後的際遇卻有很大的差別。魯迅成為文學巨擘，獨領風騷，為千百萬讀者所崇拜，於文名顛峰時期撒手塵寰，迄今猶為人景慕。而周作人的文章溫柔敦厚，別具一格，不同於魯迅的辛辣狂狷，但在文壇亦舉足輕重，為文化界所矚目。抗戰時期留在北平的周作人，曾有媚日言論，被人譏為漢奸，抗戰勝利後，險遭牢獄之災，使這位晚年自號「知堂老人」的周作人在人格上留下斑斑污點。而他們兄弟，中年反目，至此不相往來，也是文壇業餘酒後的

談資。一九〇六年六月，魯迅與周作人結伴由紹興老家出發，經上海赴日本留學，這一年正是日俄戰後，小小日本竟然打敗號稱巨大「北極熊」的蘇俄，使少年周作人對日本感到神奇和神祕。

### 領略日本文化神韻

抵達東京的那天傍晚，周作人隨魯迅抵達寄宿的本鄉湯島二丁目伏見館，應門的是位十五、六歲的日本少女，經魯迅介紹，知道她是館主的妹妹兼作下女的乾榮子。她替客人搬行李、送茶水，赤著一雙白嫩的腳在屋裡輕盈的走來走去，使周作人想起故鄉水鄉的婦女，也是經常赤腳走路，他的腦海裡浮現著著名的「江南好」詞：「江南好，大腳果如仙，衫布裙綢腰帕翠，環銀釵玉鬢花偏，一溜走如煙。」

「，想着想着，周作人不禁微笑起來。初蒞日本，使他對日本的印象極為美好。

周作人好像愛上了什麼？這位少女，還是她的祖國，周作人說不出來，只覺得親切而已。直到卅年後，周作人為日本立國二千六百週年撰寫「日本之再認識」一文，猶津津樂道日本的「赤足之美」：「我相信日本民間赤腳的風俗總是極好的，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，在室內席上便白足行走，這實在是一種很健全很美的事情。我所嫌惡中國惡俗之一是女子的纏足，所以反動的總是贊美赤腳，想起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之句，覺得青蓮居士畢竟是可人，在中國古人中殊不可多得」周作人由日常生活中領略到日本文化的神韻，還隱隱的感到中國消失的文化和某些習俗傳統依然保留在日本。

人生哲理耐人尋味

周作人和魯迅的棲身地，僅四席半，約九平方公尺，是名副其實的斗室，但地有草蓆（榻榻米），牆邊有閣（壁櫥），窗格子上貼紙，可稱紙窗。夜晚由壁櫥取被攤開即可睡，住了兩三天，周作人即感到它的適意，不禁遐想假如能地處遠村，還可憑著窗看山或者浴衣躺在席上，一邊品茶，一邊靜聽林濤和流水聲，又可享受舊日長閑的風趣。於是，周作人再一次感到了日本簡素方便的簡易生活，這與幼年時代已學習以為常的鄉人「簡單中有真味」的生活方式，存在著某種內在的相通。

魯迅與周作人

待到房主人送上吃食時，更加深了周作人的這種親切感。日本下宿生活是相當清苦的，每天早上兩片麵包加黃油，中午和晚上兩餐飯，蘿蔔、竹筍而外，絕少肉食。缺少油水，中國留學生多受不了，周作人卻甘之如飴，他說：「吾鄉窮苦，人民努力工作，日吃三餐，唯以鹹菜、臭豆腐、螺絲為菜，故而不怕鹹，亦不嗜油如命。」所以他吃日本的清淡菜飯，覺得滋滋有味。日本食物的另一特色是冷，冷飯冷菜，一般中國人不習慣，但日本人的

午晚餐都是冷「便當」，吃便當使周作人想起十二、三歲時，在杭州陪侍祖父，每天一頓稀飯和兩頓乾飯的定時食每感不足，他只有偷冷飯吃，獨自到灶頭，從掛著的飯籃裡揀大塊的飯直往嘴裡送，當時覺得「這淡飯的滋味簡直無物可比，可以說是一生所吃過的東西裡的最美味」。後來回想起來，是既辛酸，又略帶甜味的。聯想起「咬得菜根，則百事可做」那句中國古話，周作人甚至覺得這裡包含著人類（無論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）共通的人生哲理，那就更耐人尋味了。

中日文化的交流史

其實，魯迅和周作人都愛吃、會吃，以後在日本吃食中，周作人發現一種新趣味。伏見館附近有許多美食，諸如青木堂的豬肉「琉球煮」，煮時放點糖，和紹興的吃法相近。本鄉的一處小店有寄售的大垣羊羹，三丁目藤村製的栗饅頭，雖是豆米素食，卻別有風味，到處有售的落花生，甚至引起周作人考証的興趣，他發現落花生，中國傳說來自日本，而日本則俗名南京豆，暗示出自中國，又如南瓜，日本稱糖茄子；羊羹原出唐浮屠，傳入日本後，成為日本的特產，在中國反而失傳，由日本再傳入中國後，反成為「東洋點心」了。周作人由此而打開一個思路：日本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，有些又是中國某處的什麼。如味噌湯與乾菜湯，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，牛蒡與蘆筍，鹽鮭與勒蕪，都是相似的食物。又如大德寺納豆即鹹豆鼓，澤庵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，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，刺身即廣東的魚生，壽司即古昔的魚鮮，其製法見於「齊民要術」，其中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，這就是說，周作人尋到的不僅是日本的吃食之美，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頁頁饒有興趣的記錄。

周作人到日本，和魯迅一樣，很自然的生活完全日本化，衣食住行都是日式的，他穿和服，足登木屐去上學、上街，覺得沒什麼不方便。他覺得日式生活保有許多中國古俗，使他重溫中國早期的生活，感到有一種心靈的契合。他後來回憶說：「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，便不曾回過一次家，我稱東京為第二故鄉，也就是這個緣故」；他還說：「我們在日本的感覺，一半是異域，一半卻是古昔，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，所以不是夢幻似地

「空假」。這感覺是真實的：儘管只是「第一眼」的印象，對於周作人，日本已不再是神祕的異鄉。一般的留學生往往注目於日本文化所受西方的影響，強調中日文化的差別，而周作人卻如此注目於中日文化的融通，從這方面說，周作人的「第一感覺」又是獨特的。周作人在伏見館住定後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學日本話，他先進中國留學生會館的日語講習班，學得基礎日語，第二年轉進法政大學特別預科，學習日文、英、算、歷史等科，周作人獨對日文有興趣，對幾位日文老師讚不絕口。

### 新居所成革命中心

這時候，周作人的留學功課是平淡的，生活卻是熱鬧而戲劇性的。就在他到達東京的第二年發生徐錫麟刺殺恩銘失敗而被挖心事件，不久又傳來了秋瑾被殺的消息，徐錫麟、秋瑾都是紹興人，自然在紹興留學生中引起強烈的反應。在紹興同鄉會召開的抗議會上，圍繞是否發電報給滿清政府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，徐錫麟事件後，他們兄弟遷居本鄉東竹町的中越館，在這裡，許多造反的革命人物不斷的來訪，包括和徐錫麟一同在紹興造反的陳子英

，在浙西遊說綠林起義的陶煥卿、陶望潮兄弟和章太炎的女婿龔未生，都是熱情的革命者，魯迅在這一時期也加入了「光復會」，成為革命黨員，只有周作人鼓不起革命的熱情。魯迅因此給他取了個「都路」的綽號，日本語的意義為「鶴」，因而後來他寫文章，即用「鶴生」做筆名。

### 飽覽歐亞小國名著

這時，周作人唯一的樂趣，就是逛書店，本鄉的「伍舍」、「丸善」、「南江堂」、「東京堂」等都是他和魯迅常去的書店。南江堂以出售德文書著稱，東京堂常有日本新刊書與雜誌，文求堂多中文舊書，郁文堂、南陽堂總分店則以賣洋書出名，都是各具特色，周作人、魯迅（還有許壽裳），懷中有點錢，就像技癢一樣，總要到書店去「逛」一趟，每回都是搜括一空而歸，於是，相視一笑：「又完了！」近代日本素有「世界窗口」之稱，日本出版界對西方文化潮流特別敏感，每有新書即迅速譯刊，因而周作人在日本讀到的文學作品有匈牙利、波蘭、保加利亞、芬蘭、希臘及東方小國的一些作品，內心傾向同情弱小民族。這個時候，他也同樣讀

了俄國許多傑作，俄國不是小國，但正在國內掀起反抗專制的革命，所以也引人注意。後來周作人讀到安特路朗的「習俗與神話」、「神話儀式和宗教」兩書，開始對人類學產生興趣，他說：「我因安特路朗對人類學派的解說，不但懂得神話及其同類故事，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類學」，而「我對人類學稍有一點興味，這原因並不是為學，大抵只是為人」。人類學的發現，使得周作人衝破「國家」、「民族」的狹窄範圍，進入了對於「人」自身的思考，這不僅是對以「人不當作人」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專制主義傳統文化的根本否定，而且融入了廿世紀世界性的「人」的覺醒與解放潮流。周作人從人類學出發，圍繞著對「人」的認識，把知識的觸角伸向相當廣闊的領域，這包括道德觀念起源、發達史、生物學、性心理學、兒童文學、童話學、醫學史、妖術史、民俗學等等新的現代學科，他悉心研究了一大批這些學科的經典性著作，如弗來則（J. G. Frazer）的《金枝》，謨理斯（Havelock Ellis）的《性心理研究》，威思忒瑪克（Westermarck）的《道德觀念起源發達史》，懷德（Gilbert White）的《色爾彭的自然史》，哈忒爾

(Hartland)的《童話的科學》，麥扣洛克(Macculloch)的《小說之童年》等，使周作人眼界大開。

### 兄弟合作翻譯名著

閱讀興趣轉向翻譯，魯迅的促進作用不可忽視。創辦出版雜誌，開創新的文學活動，這是魯迅在一九〇六年春天由仙台醫學校退學後所決定的新方針。在籌辦「新生」雜誌時，周作人是魯迅最忠實的合作者，原定五名發起人中最後只剩下三人，其中就有周作人；他還專門為「新生」寫了一篇「三辰神話」。「新生」夭折後，魯迅感到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的寂寞，這時，默默地支持著魯迅的，唯有周作人。周作人後來這樣回憶兄弟倆一起從事翻譯工作的情景：「陰冷的冬天，在中越館的空洞的大架間裡，我去管翻譯起草，魯迅修改謄正，一點不覺得困乏或是寒冷；只是很有興趣地說說笑笑，談論裡邊的故事。」周氏兄弟合作先後譯出了「紅星佚史」(〔英〕哈葛德·安特路朗著)、《勁草》(〔俄〕托爾斯泰著)、《匈奴奇士錄》(〔匈牙利〕育珂摩耳著)、《黃蓋炭畫》(〔波蘭〕顯克微支著)、《黃蓋

薇》(〔匈牙利〕育珂摩耳著)等多種著作，而一九〇九年二月，兩人出版的域外小說集，則是兄弟合作的里程碑。

### 辦報宣揚虛無主義

一九〇七、一九〇八年間，兩兄弟合作「河南雜誌」與「天義報」，以「報」刊為園地，發表了一批文章，其中魯迅《人之歷史》(載一九〇七·一二《河南》一號)、《摩羅詩力說》(載一九〇八·二·三《河南》二·三號)、《文化偏至論》(載一九〇八·八·《河南》七號)、周作人《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》(載一九〇七·一一·《天義報》一一·一二期合刊)、《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》(載一九〇八·五·六·《河南》五·六號)、《哀弦篇》(載一九〇八·《河南》九號)等，在當時雖沒有引起多大社會反響，但卻都是中國現代思想史與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。周氏兄弟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領域發出了自己的獨立的聲音。——在此之前，他們僅是嚴復、梁啟超、章太炎等人的學生而已。不過，文章的中心思想，仍是魯迅的，魯迅的立人思想貫穿於魯迅及周作

人這一時期的文章中。不論「河南雜誌」或「天義報」都是無政府主義的陣地，周氏兄弟大量介紹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架構。周作人更醉心克魯泡特金，他翻譯了克著「西北利亞紀行」及「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」，刊於天義報。共產黨徒認為由虛無主義可過渡到共產主義，這是中共建政後尊崇魯迅的主因，邁入老年的周作人也因此備受禮遇。一九〇七年年底，在東京已形成以魯迅為中心的文人圈子，由魯迅的革命朋友陶望潮發起，周氏兄弟與許壽裳、陳子英、汪公權一起學習俄文，算是一次集體行動；教員是因參加革命而亡命日本，名叫密瑪理亞孔特夫人的俄國女人，學生大都是傾向革命的，學習目的也很明確：正如周作人所說，「我們學俄文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學」，因此，這次學習，政治色彩是濃重。但周作人並非積極推動者，他是隨大流的。因此，俄文班中途夭折，俄文學習中輟，周作人都無所謂，後來提起此事，他也用「散伙了事」四字一筆帶過。

### 章太炎演講影響深

對周作人真正產生影響的事，是一九

○八年集體到民報社聽章太炎演講，此事由魯迅發起，約定每週日午前至民報聽講，參加的人有周氏兄弟、許壽裳、錢家治、龔未生，聞訊趕來參加的有錢玄（錢玄同）、朱希祖、朱宗萊共八人。

民報設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，一間八席的房子，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；章太炎坐一面，學生圍著三面聽。用的書是《說文解字》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講，文字學本來是很枯燥的，章太炎講起來，卻很有趣。例如，說「鬼」字，章太炎說鬼頭即是死人頭顱，學生中遂有人附會謂「字即像零星骨殖，章也不反對。過後細想章的說法自有道理：古時鬼的觀念是具體的，與後世說魂說氣不同，所以可能最初即是死人或枯骨，鬼字形象足以當之，各民族原始圖畫中多以骷骸表示死神，可為旁証。中國文字中本來有些素樸的說法，章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；如卷八尸部中「尼」字，據說原意訓路，即後世的「呢」字，而許慎「從後通之也」的話很有點怪裡怪氣，這裡也就不能說得更好；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「尼丘」來說，所以更顯得不大雅馴了。據說章太炎愛發脾氣，那是對著有錢有勢的闊人的；對於青年卻

是很好，隨便談笑，同家人朋友一般。夏天盤膝坐在席上，光著膀子，只穿一件長背心，留著一點泥鰍鬍子，笑嘻嘻的講書，莊諧併出，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裡的哈喇菩薩。課餘休息時，章太炎常說些閑話，有時也發妙論，使滿座皆驚。一次突然對

弟子講起他對法律的意見，他說舊刑律對於竊盜罪的判罪以所偷多少為標準，這是很不公平的。因為這只是為富人的利益著想，於道理上也說不通，所以他主張論賊應以失主的財產為比例，假如他只有一百塊錢，被偷了五十便是損失百分之五十，但是有百萬家財的被偷去一萬元，那只是百分之一，比偷五十元的罪要輕得多。弟子們聽了這話都覺得有理，卻不知道是否真的行得通，因為都不是學政法的，也就不能贊一辭，只得「姑妄聽之」——章太炎的本意也在「姑妄說之」。章太炎又常對人們只知請他講學表示不滿，一再十分認真地對弟子們說，你們不知道我所長的是在談政治。弟子們對他這方面的著作，特別是發表在「民報」上的，都熱心地讀過，也沒有什麼反對，不過心裡還是覺得老夫子的偉大第一是反滿清，第二是有學問，實在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政治才能。

章太炎講課很民主，任由學生發言議論，錢玄同常常打斷講課，打開「話匣子」指手劃腳的大講特講，章也不以為忤。這個作風使周作人感到震驚，因為他未見過這樣的師生關係。

「說文解字」講完後，講莊子，章太炎用佛學詮釋「齊物論」，周作人不太感興趣。章太炎對周作人影響最大的是復古精神，周作人曾聽錢玄同或龔未生說起，章太炎居東京時，早晨聽外邊賣鮮豆豉的呼聲，總要對弟子們說：「這是賣什麼的？natto, natto, 叫的那麼淒涼！」這件事，給周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；以後周作人說，這賣鮮豆豉的呼聲，與北京寒夜深更賣硬麵餛飩的叫賣聲十分相近，而那「淒涼」的聲聲叫喚，最能引起抱有亡國之恨游子的共鳴。周作人又聽說，錢玄同的哥哥錢念劬與夏穗卿在東京街上走路，看見店鋪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，常指點慨嘆，謂猶存唐代遺風，非現今中國所有。

### 留日學生充滿復古

復古情緒與民族主義思潮交織，幾乎支配了當時的日本中國留學生界。周作人說，他讀了「新民叢報」、「民報」、「

「革命軍」、「新廣東」之類，一變而為排滿及復古，堅持民族主義達十年之久。而民族主義當時有雙重意義，對外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，對內則是反對清朝統治者對於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壓迫與統治，以及其所實行的「寧贈友邦，不與家奴」的賣國主義政策。「外抗列強」與「內覆清廷」就成為當時民族主義的兩大口號。正是在反清旗幟下，一些漢族知識分子產生了「恢復漢族統治正統」的幻想。章太炎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提出了「光復」的口號，聲稱「吾所謂革命者，非革命也，曰光復也，光復中國之種族也」。一九〇六年章太炎出獄訪日，又進一步號召用「國粹」、「激勵種性」，「增進愛國熱腸

」，親自主持國學講習會，以「復古」即恢復漢族傳統文化作為反對滿清統治的思想武器。這在當時的愛國留學生看來，是順理成章的事。周作人後來回憶說：「我那時是民族革命信徒，凡民族主義必會有復古思想在內，我們反對清朝，覺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都是好的……」

後來周作人又追隨章太炎學習梵文，因為字形難記，發音難學，印度籍教師教的也不得法，師徒只去了兩次，即知難而退。但周作人對章太炎認真的精神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一九三六年，章太炎病逝，周作人寫了篇悼念文章，題目是「記章太炎先生習梵文事」，最後一段說：「太炎先生以樸學大師兼治佛法，又以依自不依他

為標準，故推重法相與禪宗，而淨土祕密二宗獨所不取，此即與普通信徒大異。……且先生不但承認佛教出於婆羅門正宗，……又欲翻讀吠檀多奧義書，中年以後發心學習梵天語，不辭以外道為師，此種博大精神，實為凡人所不能及，足為後學之模範者也。我於太炎先生的學問與思想，未能知其百一，但此偉大的氣象得以懂得一點，即此一點卻已使我獲益非淺矣。」這就是周作人心目中的章太炎：既「依自不依他」，堅持思想獨立自主性，又兼收各家，「不辭以外道為師」，儼然博大精進的大師氣象。

這正是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

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
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